

社会幸福：基于学说史的视角

陈惠雄

(浙江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幸福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是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中历史与现实同条共贯的主题。因此，幸福思想已经深深植根于各种学说史、思想史中。在百年理论沉寂之后，幸福命题今天被重新重视并广布于全球性的政治决策与市民社会中。现实的热衷总归有现实的起因，那就是现代社会遇到了诸多违背快乐幸福原则的现实发展难题。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引起了对发展的终极目的与“幸福悖论”的思考，并指向偏激的现代拜物教社会行为。通过对幸福学说的历史回顾，把现实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与历史哲人思想相比照，以明悟其中的精粹，能够为我们构建科学的幸福社会发展之路提供佐策。

关键词：幸福；学说；社会经济；历史与现代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 (2014) 02-0164-08

导 言

幸福或快乐 (happiness) 是人以自我与对象的存在与消耗为基础产生的一种愉悦的精神感受或心理体验。这种愉悦的精神感受或心理体验是人的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是人类生存的终极目标。然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却越来越偏离了这个目标与原则，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通过回顾历史上哲人关于人类行为目的的学说，期望能够校正我们的发展偏好与行为，让我们的社会发展得更加和谐、幸福。

古希腊以来，幸福思想一直在各种思想体系中发展，以探索人类行为的动力、根源与终极性的发展趋向。古代社会的各种学问基本上都是哲学体系下的一个分支学科，古代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往往同时又是哲学家。色诺芬的《经济论》实际上就是他研究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副产品，其中饱含幸福经济思想与农业幸福论思想。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都是具有多方面社会科学成就的幸福（快乐）论学者。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分工的快速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扩大与深化促进了其自身的研究分工，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相继从哲学体系中独立出来，但幸福始终是西方思想史中的一个主要命题。达林·麦马翁在《幸福的历史》一书中总结了西方各个时期的幸福观，如幸福等同于幸运，等同于德行，等同于善，等同于及时行乐与快乐，等等。^①从社会科学演绎的角度讲，其幸福学说中的各种思想特色都值得关注。因为，幸福是关于人类行为的集成性的东西，不可能只被个别事物所包含，比如今天被许多人痴迷的 GDP（国内生产总值）。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JY0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526）。

作者简介：陈惠雄，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幸福经济学。

① 达林·麦马翁《幸福的历史》，施忠连、徐志跃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13页。

多学术视野中的幸福学说

人类幸福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个性、家庭、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等等，无不对幸福产生着重大作用。因此，思想史中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从各个思维向度形成的幸福学说，异彩纷呈，值得我们从中汲取思想营养。

1. 伊壁鸠鲁的快乐净收益概念与选择行为理论

伊壁鸠鲁是第一个基于苦乐辩证法而阐述选择行为的思想家。他提出，快乐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但我们并不选取所有的快乐。当某些快乐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时，我们每每放过这许多快乐；如果我们一时忍受痛苦而可以有更大的快乐随之而来，我们就认为有许多种痛苦比快乐还好。伊壁鸠鲁认为“就快乐与我们有天生的联系而言，每一种快乐都是善，然而并不是每一种快乐都值得选取；正如每一种痛苦都是恶，却并非每一种痛苦都应当趋避。对于这一切，我们必须加以权衡，考虑到合适和不合适，从而加以判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觉得善是恶的，而有的时候，相反的，我们可以觉得恶是善的。”^① 伊壁鸠鲁提出的上述观点实际上是后来杰文斯的“快乐净收益”（快乐减去痛苦的剩余）概念和福利经济学的“净福利”概念以及今天西方经济社会学的选择行为理论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此基础上，伊壁鸠鲁继续提出了相当于今天西方经济学“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行为”、“心理性贫穷”以及“习惯资本”等行为经济学的基础思想。伊壁鸠鲁认为“知足是一件大善，并不是因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有很少的东西享用，而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满足于很少的东西。”^② 伊壁鸠鲁这段话讲到了一个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满足的心理问题，对“心理性贫穷”是一个有效的揭示。即当我们受约束于一定的资源供给水平时（这个约束条件是永恒存在的），“知足”成为提高主观幸福感、减少心理性贫穷并克服物质利益主义带来的痛苦的重要的内生心理力量。伊壁鸠鲁认为“当要求所造成的痛苦取消了的时候，简单的食品给人的快乐，就和珍贵的美味一样大；当需要吃东西的时候，面包和水就能给人以极大的快乐。养成简单朴素的生活习惯是增进健康的一大因素，使人对于生活必需品不加挑剔。当我们偶尔过比较奢侈的生活时，朴素的习惯也可以使我们处理得更好一点，而对于命运无所畏惧。”^③ 在这里，伊壁鸠鲁揭示了两个重要理念，一是淡化奢侈生活对于人们健康的重要性（脱离了物质利益中心主义掌握的自由人高级社会发展阶段的人类生活，将是一种毫无疑义的简单化复归趋势）；另一个是朴素生活的“习惯资本”对于提高人们快乐积分的重要性。这些理念正是今天的行为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的理论基础，并对建设幸福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 洛克的偏好当期行为理论与基于理性行为的快乐总积分思想

洛克是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哲学与政治学领域的影响力巨大，被认为是英国最温和而又最成功的“光荣革命”的倡导者。洛克提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观点，这一观点成为后来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④ 洛克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和他的快乐学说具有一致性。或者大致可以认为，一切认识到快乐幸福为人类行为终极目的这一科学真谛的经济社会学家，都会把劳动价值论作为价值论的理论基础。因为，这是显示把人置于经济学研究核心地位以及显示人的生命成本

①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04页。

②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04页。

③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04页。

④ 蒋自强、张旭昆《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页。

投入为经济学成本的根本投入的一个必然推理。^①

洛克认为,人并非总是依照理论来推测多半会确保他有最大快乐的方式行动的,我们对现时的快乐比对将来的快乐更重视,对最近将来的快乐比对遥远将来的快乐更重视。可见,即使趋乐避苦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与终极目的,那也必须追补一句:依快乐或痛苦在未来的远近为准,快乐消减它的魅力,苦痛丧失它的可怕。^② 洛克在这里揭示了人类选择行为中的短期行为倾向问题。这一理论实际上成为今天有限理性理论的重要基础,并对我们如何预防人类的短期行为,贴现远期快乐与痛苦的当期效用,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理论思想。

那么,如何解决人类的短视行为倾向问题呢?按洛克的意见,要紧的是人应该尽可能以自己的长远利益为指南,因为只有这样人们的自我利益才能够和全体利益一致,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快乐总积分最大化。洛克认为,人应当有远虑,远虑是仍待倡导的唯一美德,因为一切失德都是失于远虑。洛克的这一思想是针对人类存在的普遍性的短期行为倾向而提出来的,对于我们认识人类自身的不足,处理好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3.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与国民总幸福计量原理

边沁是快乐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边沁的快乐思想有三个相互连贯的内容,一是快乐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最高的善。二是追求快乐应当有其道德准则,即有道德地追求快乐——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为国家立法与道德的出发点和归宿处。三是快乐还应有数量指标,以具体计算苦乐,完成对最大快乐概念的实际度量。

边沁认为,法律的制定和形成都是人们有意识活动的结果。他提出,立法应遵循的根本原则就是功利——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量的幸福”。他强调,增进人类社会幸福的办法应从立法开始,通过立法,用赏罚的方法,特别是通过惩罚那些破坏幸福的行为,来增进人类的幸福。显然,这些理论可以应用于我们的法经济学中。这样,用数学的方法计算苦与乐,成为立法与经济学计量幸福的前提条件。边沁为此提出了测算快乐的七个指标:强度(intensity)、持久性(duration)、确实性(certainty)、远近(propinquity or remoteness)、继生性(fecundity,即由此苦乐产生彼苦乐的联系效应)、纯度(purity,即快乐的获得是否有某些痛苦伴随,或者痛苦之后是否有快乐的产生)、范围(extent,即苦乐扩大影响到的人数,某个政策或行为是否会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或者痛苦)。^③ 边沁的这些快乐特性区分涉及快乐影响因子的计量权重差异、净福利计算、节能式快乐模式的建构及快乐乘数效应计算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今天仍然没有具体化为我们的经济学计量模型。而处理这些特性的一个简单而科学的计量办法是假设所有的快乐特性效应均可以反映为即期测度的相应指数,根据这些特性而进行的幸福经济与社会建设,则是一个具有比福利主义经济学更加优美的科学课题,它可以帮助个人和社会选择更加科学的发展方式,实现个人与社会的最大化幸福效用目标。

从对快乐追求的道德判断到对快乐的“数”的测定,是边沁的快乐主义理论的一大特色与贡献。而对于快乐数量的测定正是今天幸福经济学之幸福指数测量、或者叫国民幸福总值核算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边沁的快乐主义还存在着关于以个人快乐为行为基点和以多数人幸福为行为准则之间未能调和的理论矛盾,苦乐的具体数字测算也需要进一步借助实验心理学等方法进行解决。并且,贝克尔认为,边沁还没有能够做好偏好稳定的假设,导致他的理论无法完成实证验证。^④ 事实上,快乐比偏好更加基础与稳定。也许贝克尔对边沁主义的理解,也是不全面的。笔者认为,边沁把快乐作为人类行为的稳定的终极价值原则,应当已经内含了人类追求快乐的稳定性与一致性。

① 陈惠雄《人本经济学原理》,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2-114页。

②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44-145页。

③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26页。

④ 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2页。

然而，边沁毕竟较为系统地阐述、集成并完善了快乐思想理论体系，把快乐理论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是对自伊壁鸠鲁以来的欧洲快乐主义思想长期展延的第一次富含创新性的综合与总结，并对当时欧洲社会的功利主义思潮的蔓延产生了重要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这样评述道：在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等人开始形成消费者需求理论之前，经济学家们经常讨论什么是决定欲望的基本因素。例如，边沁分析了14种基本的快乐与痛苦——所有其他的快乐与痛苦都被认为是这些基础集的组合。^① 根据张五常的研究，边沁在效用论（utility）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效用代表快乐或者快乐指数。二是每个人都争取这个指数越高越好。三是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这也成为福利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础。也正因此，张五常称边沁为经济哲学大师。^② 可见，边沁思想在经济、道德、立法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影响之深远。

4. 密尔基于分工协作的利他功利主义理论

边沁之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著成《功利主义》，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与完善。密尔（旧译穆勒）认为，功利主义以快乐为目的，而功利就是快乐自身和痛苦的消除。密尔认为，只有快乐才是值得欲望的，这一情形已被人人都在渴望幸福这个心理学的经验事实所证明。密尔特别强调把精神快乐置于物质快乐之上。他把目的与达到目的的手段两者区分开，认为美德也是争取幸福的手段。而快乐是最终目的，功利原则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原则。关于利他的快乐主义，密尔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即社会产生合作，合作产生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产生共同的追求目标，于是就有利他主义。而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是保证实现最大快乐的重要前提。可见，密尔已较边沁的单纯讲人类因有天生的同情倾向和慈善心而产生利他主义的思想有明显的视角区别。密尔更多是从社会分工与协作的相互需要来论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利与义、经济利益与道德情操的辩证统一性，完善了边沁的社会功利原则思想，基本完成了经济哲学领域中的快乐思想的古典研究。^③

事实上，在密尔之前，亚当·斯密就已经认识到追求幸福的利己主义本性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出发点，从而使得快乐主义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心照不宣的前提。密尔对斯密的利己主义与边沁的社会功利主义思想进行糅合与改造，认为利己主义在本质上都是对于精神快乐的追求，并把这一思想应用于古典经济理论研究，使快乐主义思想由哲学转向经济学领域。密尔的最大贡献在于通过解释分工，创立了由斯密利己主义和边沁社会功利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功利主义经济学说。密尔揭露了少数人快乐的剥削制度，尖锐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和共同享受劳动成果的公有制社会。密尔完成了具有折中主义色彩的古典经济学综合，并使得他的经济哲学思想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④

密尔在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折中主义经济学思想影响了欧洲半个多世纪，在经济学说史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密尔把精神、心理等主观因素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用支出劳动的主观感受来看待劳动，用资本家欲望的强弱来解释资本积累等，这些观点对后来奥地利学派、数理经济学派等用主观心理因素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⑤ 而快乐与痛苦则是密尔功利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多数人幸福是密尔功利主义经济学的目标。

5. 杰文斯在劳动苦乐均衡分析基础上创立的边际效用理论

19世纪70年代，杰文斯和门格尔等人在边沁快乐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边际效用理论。杰文斯是从作为消费者的经济人的个人角度去理解经济学的，他认为人们消费的目的是追求快乐减免痛苦。而

① 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00页。

② 张五常《学说需求》，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第110页。

③ 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Dover: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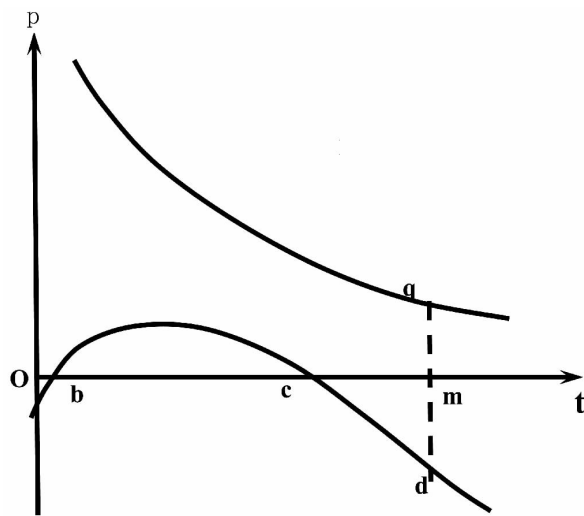
④ 蒋自强、张旭昆《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5页。

⑤ 蒋自强、张旭昆《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7页。

物品能给人们带来快乐（或负痛苦）的性质便是物品的效用。杰文斯认为，经济学的目的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痛苦换取最大快乐。他把劳动定义为“心或身所忍受的任何痛苦的努力，而以未来利益为全部目的或一部分目的者”^①。把劳动所带来的痛苦称之为负效用，劳动收益得到的快乐则是正效用。而均衡的劳动时间则由劳动的边际收益（正效用：工资产生的快乐）与边际成本（即由劳动产生的负效用：痛苦）相等的这一点 m 来决定。^② 可见，在劳动苦乐均衡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边际效用分析思想，揭示了人类生命活动的基本原则——生命成本支付与收益的边际均衡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只有当消费者在一定劳动时间（ t ）内付出的生命成本即劳动的负效用（ v ）所获得的劳动产品即工资报酬（ x ）与用此收入购买的商品对消费者生命补偿效用即劳动产出的总效用（ u ）边际相等时，才是实现了消费者效用（快乐）最大化。这一关系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frac{dv}{dt} = \frac{dx}{dt} \cdot \frac{du}{dx}$$

公式中， v 为劳动的负效用， $\frac{dv}{dt}$ 为劳动的边际负效用， x 为劳动产品， $\frac{dx}{dt}$ 为劳动产出对时间的导数， u 为劳动产出的总效用， $\frac{du}{dx}$ 为劳动产出的边际效用。上式表示单位时间内劳动负效用（痛苦）的补偿事实上取决于单位劳动时间内取得的工资收入与该收入产生的消费效用（快乐）。杰文斯关于劳动快乐与痛苦的边际均衡原理，实际上体现了幸福经济社会学的基础思想，见下图。



劳动的边际效用曲线和边际负效用曲线

图中，横轴为时间，纵轴为边际效用和边际负效用。 pq 曲线为劳动产品的边际效用曲线， bcd 曲线为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曲线。该曲线表明，在 Ob 时间内，劳动由一开始的不习惯变得适应和有趣味，在 bc 时间内劳动带来正效用。 c 点之后，劳动产生边际负效用。^③ 在 m 点，劳动的边际负效用 md 正好等于劳动产品的边际效用 mq ，故 m 点便是均衡的劳动时间。

杰文斯的这一思想对于建立一个和谐的劳动组织与公平的社会分配规则具有重要的基础理论意义。杰文斯的边际效用理论与其分析方法是正确的。之所以讲它正确，是他揭示了维系在人类行为中的最根本性的规则：生命成本支付与收益均衡即为消费者效用（快乐）最大化的原理。^④ 杰文斯的劳

① 杰文斯 《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3页。

② 杰文斯 《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4页。

③ 蒋自强、张旭昆 《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7页。

④ 陈惠雄 《生命成本：关于消费函数理论的一个新假说》，《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8期。

动边际负效用概念以及劳动痛苦等于劳动带来的产品产生的快乐的时间均衡思想，即劳动时间均衡的条件为用单位 x 产品带来的边际效用与获得该产品的劳动负边际效用相等，为以后边际主义者提出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准备了基础。杰文斯的这一思想和劳动供给曲线又被进一步发展为具有 3 个拐点和 4 种斜率的劳动供给曲线。^① 杰文斯实际上是在劳动这一最能够体现人类行为属性的资源上，提出了资源最优配置的一般原则，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便是边际主义的主要成就。快乐与痛苦成为这一成就的核心思想是显而易见的！

6. Yew - Kwang. Ng (黄有光)：快乐应是人人所有公共政策的终极目的

快乐幸福思想的另一支重要发展，是由人类行为动力学理论到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洛克、斯密等人主要是从“趋乐避苦”的行为动力学角度来论证快乐与幸福思想的。自边沁开始，快乐思想开始由行为动力学转向行为伦理学的探讨，即由利己快乐主义向社会功利的利他快乐主义转变，产生了幸福思想的多学科萌芽。在密尔的著作中，快乐主义几乎完全发展为一种重要的关于利他主义的行为伦理学思想，并为福利经济学奠定了重要的伦理思想基础。霍布森的福利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建立在对劳动与娱乐、自由产品与经济物品的均衡分析的基础上，而导向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快乐目标的一种经济社会学理论，并在晚年最终由福利经济学转向社会学研究。

随着经济学、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发展，快乐概念因其明显的主观性和哲学色彩而逐渐淡出主流研究领域。然而，在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中的快乐幸福思想仍然在发展。以 Yew - Kwang. Ng (黄有光) 为代表的一批现代福利经济学家摒弃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偏好满足即效用的新效用主义理论，把快乐与偏好以及建立在偏好基础上的效用概念相区分，把快乐与理性相联系，提出了“快乐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的理论思想。黄有光认为，由于信息不全、无理性以及亲缘利他三个因素，使得人类的大量偏好行为偏离了快乐最大化目标，从而证明了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偏好的效用分析理论存在着基础性的理论缺陷。^② 这一努力将有可能使经济学家们最终认识到建立在偏好满足的效用理念基础上的最大化假设事实上存在着偏离快乐与幸福的大量无效率情况，从而有必要把快乐置于对偏好的终极价值检验地位，使许多无理性偏好行为得到科学的价值引导和严格的制度纠正，以使人类行为变得真正有利于社会总福祉增加，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目标。

黄有光认为，快乐不但是每个人的终极目的，也是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因此，快乐也应该是（但未必是）所有经济政策与其他公共政策的唯一终极目的。对这一道理的认识与推广，有助于大量减少无谓的痛苦，有助于避免应该最终为快乐服务的道德、原则、法律、主义等被野心家与局部利益团体或个人所利用，从而违背大多数人的长期快乐。^③ 为此，黄有光认为福利经济学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分析偏好而不分析作为福利经济学终极目标的福祉或快乐。而偏好和快乐是有差异的，过度物质主义的偏好会产生一系列的环境破坏效应，可能使经济增长反而减少福祉。^④ 黄有光充分强调与延伸了快乐为终极善的经济哲学理念，并把它置于福祉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的终极目标之中。

7. 丹尼尔·卡尼曼：以快乐体验效用作为社会决策效用的终极价值标准

在快乐主义进一步走向心理分析后，也促进了经济学的心理学化趋势，使经济学由客观分析转向主观心理分析，把经济学变为“痛苦和快乐的微积分”，并引起了心理经济学的产生。^⑤ 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 Daniel Kahneman 等人的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

① 陈惠雄 《快乐原则——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47 - 249 页。

② 黄有光 《快乐、福利、人本主义——回应陈惠雄博士》，《财经论丛》2000 年第 5 期。

③ 黄有光 《快乐应是人人所有公共政策的终极目的》，《经济学家茶座》2008 年第 5 期。

④ 黄有光 《从偏好到快乐：通向一个更加完整的福利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 1 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10 - 139 页。

⑤ 颜鹏飞 《西方经济学研究大纲》，《经济学动态》1996 年第 9 期。

ogy) 研究成就。卡尼曼的最大贡献在于通过实验心理学验证,证明了人类的理性局限和偏好非稳定性,认识到人类思维经常是以熟知的信息进行选择,从而违背概率规律,并存在偏好逆转情形,以此证明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并破除了主流经济学的偏好假定理论。卡尼曼认为,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行为动机的真正本质,他认为基于稀缺的决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必须以基于快乐的体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为标准,即人们根据资源稀缺性作出的效用最大化资源配置与利用规划,归根结底要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感而不是GDP增长的多少为依归。由于快乐幸福远比偏好更加基础与稳定,因此,把幸福置于人类行为的终极价值地位,才能够更好、更加有效地解决人类偏好的不稳定性以及与幸福目标背离的问题,减少“经济有发展,幸福无提高”的现代社会发展悖论的产生。

针对当今社会注重GDP工具价值(tool value)而漠视幸福终极价值(ultimate value)的情况,卡尼曼明确地区分了决策效用与体验效用,鲜明地提出“回到边沁”的理论主张。^①“这是经济学的第二次现代化,旨在实现经济学后现代转型。卡尼曼主张把体验效用作为新经济学的价值基础。这是经济学二百多年来最大的一次价值转向。如果说斯密相当于经济学中的牛顿,卡尼曼则相当于经济学中的爱因斯坦。”^②用什么作理论的价值基础,这是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学理论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它面临着社会转型转向何方或者是向哪里转的根本性的发展路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与社会学深深地搅在了一起。

卡尼曼的“回到边沁”一文实际上已经把社会发展的未来目标问题挑明。卡尼曼提出的快乐与效用(或按卡尼曼说的边沁体验效用与马歇尔决策效用)的区别,从哲学高度说就是目的与手段的区别。两种价值观的区别在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强调以人的快乐幸福为目的,决策效用(经济增长)为手段;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以物质偏好满足的效用为目的,以人为(经济增长)手段。^③快乐与效用或者体验效用与决策效用的区分,为幸福经济社会学的建立确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由于快乐—心理—社会学之间的这种日益紧密的联系,认知科学利用核磁共振脑血流仪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这类脑成像设备,大脑神经网络和心智活动之间的电化学联系已经十分清楚,心身统一性已经基本探明。如此,快乐的可计读也将为期不远。有关专家预期,至2050年左右,在行为学基础上的关于人类行为的经济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将转变为从行为到大脑皮层上的拓扑映射的研究。^④因此,神经经济学与社会神经科学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力图揭开人类行为与生物遗传学之间的某些联系,以解释人类诸如累积财富偏好(贪婪、自私)的行为是否具有遗传学基础,以及何种品种得到优化发展的趋势,从而能够给社会发展以更好的硬科学支持。

结 语

今天,打开因特网,输入幸福或快乐,都有超过上亿条的信息。我国有100多个城市与地区提出建设幸福社会的口号,幸福江阴、幸福杭州、幸福石家庄、幸福东莞、幸福广东等等,无不在幸福的旗帜下寻找社会佐治之策。这种关于幸福与快乐研究的现代情景,促进了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目的与价值问题的全面反思。而究其根源,则是在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工业化发展中,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把经济增长置于社会发展核心视阈的理论与现实趋势。然而,如果国民经济有增长而国民的当期或长期幸福均没有提高,这种增长严格而言是无意义的。这种“收入—幸福”不一致现象由美国南加州

^① Kahneman, D., Wakker, P. & Sarin, R., “Back to Bentham? Explorations of Experienced util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2, 1997, pp. 375 - 406.

^② 姜奇平 《诺奖得主卡尼曼: 回到边沁》, www.benthamism.cn/article/Details.

^③ 姜奇平 《诺奖得主卡尼曼: 回到边沁》, www.benthamism.cn/article/Details.

^④ 汪丁丁: 《拉其尔的语言与文化》,《经济学消息报》2002年7月5日。

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于1974年首先提出，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或者叫“幸福悖论”。伊斯特林悖论问题的实质很严重。因为，他是基于长期收入—幸福数据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的最新结果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人们的幸福指数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最近20年中国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如果“经济有发展，幸福无提高”的社会现象持久得不到改变，社会将会陷入一种多重矛盾激化的状态，终将加剧社会秩序的无序化。南辕北辙的非理性发展与放纵金融机会主义的发展代价已经显得异常昂贵和巨大！

伊壁鸠鲁、洛克、边沁、密尔等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解读着人类行为的幸福目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光辉总在历史的某个位置陪衬着现代人们的行为，促进我们的比照与反思。之所以要收视与回放这些思想，是因为那些思想产生于一些相对纯净的历史年代，对过度拜物教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有特别的鉴照意义。社会幸福问题的思想史研究，除了幸福在社会学中本应有的价值地位的缘故，亦由对当代社会发展引发的一系列苦乐问题的社会学理论思考而起。人们普遍认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更加幸福地生活。然而，发展的现实却较大地偏离了这样的目标，甚至发展到损害人类的命根——生命幸福之须臾不可缺的食品、水、空气的全面的不安全，走向了幸福社会发展目标的反面。

纵观幸福学说史，基本上是围绕社会与人类本身的两个相互缠结的重大问题而展开的：其一，社会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为物质，还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幸福及其幸福的要素、层次、结构等等？其次，究竟是什么限制了人类幸福的自由获取？是自然资源与科学技术约束，还是人类自身的基因缺陷与价值观偏离？理论的结论已经越来越明确，幸福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与终极价值。现实的问题是，科学技术已经发达到能够解决所有人的丰衣足食问题，只因为贫富差距、分配不公与货币拜物教等异化社会现象，导致了对资源、环境的滥用与多种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幸福指数的长周期下降。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切实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实现以人的幸福为本的科学发展。

凯恩斯在1932年曾经发出惊世预言：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或者至少是可望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展望未来，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①那么，人类的永恒问题是什么呢？是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责任编辑：王永平

^① 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高永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郑也夫序言。